

“石楠体”与当代女性传记创作

章罗生

在中国当代纪实文学史上，石楠与胡辛等是传记小说创作方面的典型代表，不但在题材内容等方面有开拓之功，而且在审美形式等方面也有其独特贡献，从而共同显示了当代女性创作的卓越成就与深厚潜力。其中石楠的创作因特色鲜明、影响广泛等而被人称为“石楠体”：它“既不同于纯属史料纪实性的传记，也不是以虚构为基础的小说，而是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创作体型”，它“不仅丰富了文体学的研究视域，更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的多元化，意义独特而深远”。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传记创作中，石楠具有重要地位。她的《画魂·潘玉良传》，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一样，不但在新时期初风靡一时、影响广泛，而且流传深远，是中国当代再版、转载与改编次数最多的经典作品之一。《画魂·潘玉良传》于1982年发表后，很多地方形成了潘玉良“热”，《文汇报》《光明日报》等20多家报刊转载、连载，10余家电影厂争相组稿，最后被搬上银幕，众多报刊发表大量评介文章；至2005年止，先后在海内外出版了13种不同版本的单行本，并被改编为话剧、沪剧与黄梅戏，还出版了3位画家的连环画，录制了长篇广播剧和长篇小说连播节目（台湾有两家电台加盟联播），并有电影《画魂》和电视连续剧《潘张玉良》等。而她的其他作品，如《寒柳·柳如是传》《沧海人生·刘海粟传》《美神·刘苇传》与《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等好评如潮、连续再版。

正是如此，石楠不仅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石楠体”，而且对后来的纪实文学尤其是女性传记创作等产生了较大影响。“石楠体”创作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在于继承与发扬林语堂等前辈的传统，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史传合一”等民族传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与同时或稍后柯兴、铁竹伟、陈廷一与王宏甲等人的创作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当代文学传记创作的独特风景，从而为中国纪实文学——尤其是“人才一科教”创作潮的发展与“纪实”时代的形成等，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概括说来，石楠的传记小说及其“石楠体”的特色和意义，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创作主客体的高度契合——尤其是突出体现了“新女性”中的“主体虔敬”，其中最关键点是“为苦难者立传”。正如作



《画魂》的版本多达20多种。

者所述：在写《一代名优舒绣文》时，舒绣文的影子“紧紧伴随着我，我激动、膜拜、昼夜不宁，眼里浮现着热雾。我和她一起苦恋，和她一起悲泣人世的不公和女人的不幸，和她一同感受奉献的快乐，成功的喜悦，助人的幸福……我常常是泪水和着墨水一起流泻，我为她的悲惨命运和不幸身世哭泣，我为她的早逝哀痛，我也为她骄傲”。在写《另类才女苏雪林》时，“我以女人的心去体悟她这个女人的心，我以我的情去感受她的情，我站在她的历史环境来感受她的人生”。而之所以为柳如是立传，也是因为“令我难忘和感动的正是她为追求自由与命运矢志不移的搏斗”，在写作中，“我的心被一种求索独立自由的悲凉号子冲击着，她走过的路，经过我的心灵的震颤和锻造，我已无法分清她和我了！”总之，“苦难造就不朽，苦难造就辉煌，苦难增添人生的光辉，如果老天假我以年，如果老天赐我健康，我会继续用我的传记小说艺术歌唱苦难，继续为苦难者立传。”这些话，实际上提示了作家的创作理念与审美追求。即：一、所选传主的人生“苦难”、经历坎坷；二、传主不屈服命运，勇于与“苦难”抗争；三、“苦难”可化为“不朽”，可“增添人生光辉”；四、“我”以健康和生命为代价，运用“小说艺术”歌唱以“苦难造就辉煌”的强者。其中还有一点，即：“我”与传主融为一体，与传主同呼吸、共命运。

为古代才媛立传的作品，主要是《寒柳·柳如是传》与《陈圆圆·红颜恨》等。其中《寒柳》在清末民初复杂、动荡的历史背景中，着力刻画了柳如是这一巾帼才媛的光辉形象，尤其是突出了她思想性格中的最重要方面：平等独立的爱情追求与舍生取义的爱国精神。而在《陈圆圆》中，作者则对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命运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即通过对陈圆圆悲剧命运的思考，对封建传统文化与世俗偏见等进行

了有力鞭挞。

然而，石楠写得更多的，还是与苦难搏斗、与命运抗争的现代女作家与艺术家。在这些作品中，作家的创作追求与传主的思想性格表现得更为鲜明。即一方面，传主所经受的苦难更多、更深重；另一方面，她们对苦难的抗争更顽强，对人生的信念更坚定，对理想的追求也更执著。如《画魂》中的张（潘）玉良，《美神》中的刘苇，《海魂》中的杨光素等等。

当然，石楠也为命运坎坷或备受争议的男艺术家与作家立传。这类作品有《沧海人生·刘海粟传》《百年风流》《张恨水传》与《回望人生路·亚明的艺术之旅》（《亚明传》）等。其中尤以《沧海人生》下功夫最大，其影响也最广泛：在2008年新版前，石楠就以刘海粟的人生故事为素材，“用不同体裁，从不同角度，写过5本书，（都）颇受读者青睐”；与《画魂》一样，它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等影视艺术后，也深受观众喜爱。其原因，除刘海粟本人的传奇经历与社会声誉即题材本身的魅力外，也和《画魂》等一样，得益于作家“苦难造就伟大”的创作理念与审美诉求。

二是鲜明的“以人带史”或“史传合一”，即表现出高度的“文史兼容”与“生命叙事”等特色。在石楠的传记创作中，除人生主题外，还有历史文化主题等。尽管作者并未刻意“以人带史”，但由于人是历史的产物、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故其传主的命运与时代历史紧密相连，而作品也表现出鲜明的“家国一体”等。这一点，在《寒柳·柳如是传》与《陈圆圆·红颜恨》中表现尤为突出。

《沧海一粟》与《百年风流》虽均为刘海粟传记，但两者内容与角度不同：前者以海翁的人生足迹为主线，写他对艺术的赤诚与求索，及苦难造就了他的伟大与辉煌，“是一部艺术家不屈不挠的奋斗史”，而后者则以其“情感

世界为主线，写他的友情和爱情生活，写他的婚恋以及和同代名家的交谊”，因而是他的一部“情史”。总之，这些作品也同样贯穿着作者“为苦难的奋斗者立传”的创作理念，表现出“主体虔敬”“情理融通”与“史传合一”等鲜明特色。正如有人所说：石楠传记小说中的“爱”包括“男女情爱”“对艺术事业的挚爱”与“对国家、民族的大爱”；它“是在历史与现实、传者（主体）与被传者（客体）之间建立的一种独特的主客为一体的‘生命叙事’”。

三是“虚”与“实”或“文学性”与“真实性”的有机融合。“虚”与“实”或“文学性”与“真实性”的关系问题，是包括文学传记与文学报告等在内的纪实文学创作极难把握而又一直争论不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而石楠，则也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有效探索并取得较成功的宝贵经验。她的传记创作，一方面坚守“求真务实”的纪实精神，决不胡编乱造，另一方面，又充分吸收虚构小说等“纯文学”的优长，大胆进行合理想象，并运用对话、心理、细节与典型描写及抒情、议论等手法，以渲染气氛、突出性格与深化主题，从而既与“历史”“报告”等拉开距离，又与“戏说”“演义”等毫无关联，而是名副其实、特色独具的传记小说。

在作品中，石楠不但直面传主的人生苦难、性格缺失与喜怒哀乐，而且大胆再现并“想象”其婚恋性爱与“风流”“浪漫”等。如潘玉良的雏妓出身、小妾地位及与田守信的无“性”真爱，刘海粟的“模特儿论战”“风流欧陆”“人生炼狱”与婚姻变故，杨光素对男人的渴望、追求与轻信，张恨水与三位夫人的“和平共处”，吴三桂与陈圆圆的“疯狂”情爱，苏雪林的无爱婚姻与公开反鲁（迅），舒绣文的孤傲、冷艳与自杀离世，谢冰莹的热烈、大胆与自由奔放，及“我”（秋云）的出名与被嫉妒、遭打压等，其描写之具体、真切与大胆、洒脱，的确在一般社会言情小说等虚构创作之上。

总之，石楠的传记创作“以其悲壮深沉的思想内涵发人深思，也以其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动人心弦”，从而在创作理念、题材内容与审美形式等方面，为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传记小说等纪实文学创作，提供了深具启发意义与研究价值的新鲜经验。从石楠尤其是其“石楠体”传记小说中，我们不但窥见了中国当代文学传记创作的创新发展，而且再次领略女性文学的独特风景与神采英姿等。

章罗生，湖南大学纪实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术名家。

